

新芽沙龙·第21期

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东南亚

2020年7月18日

今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自新世纪以来面对的一场重大挑战，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为此，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新芽沙龙，邀请国内外青年学者就中国与周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发展进行研讨。本期沙龙聚焦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会议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徐传博主持。

香港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生刘晓凤从地理学的边界概念出发，探究了东南亚国家在疫情中的边界控制及其影响。边界既可描述为物质空间领域的划分，也可描述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无形的界限和控制。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可以逐渐消除国家之间的界限，但新冠疫情在2020年初迅速蔓延，从地区、国家到市镇、社区，边界控制随时会建立，边界远远没有消退，反而以多样的形式不断涌现。

东南亚受第一波疫情的影响较小，总体疫情防控获得较多认可。其中，中南半岛的大陆国家比岛国的防疫效果更为突出，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等多国总确诊病例数控制在数百例以下。由于人是病毒传播的中介，对人员流动的控制是传染病防控的常见手段。民族国家的行动对外表现为对国界的管控，通过公民身份等特征对入境人员进行过滤；对内表现为对地区、城市进行封锁隔离，减少跨越边界的流动。

随着疫情的加剧，东南亚各国的边界控制逐渐转向更大程度的入境限制，从最初限制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到一些国家禁止非本国公民入境。通过这些强硬政策的保障，疫情期间的东南亚国家边界形成一个重要特点：过滤性增强、可渗透性降低。另外，由于口岸的关闭或通关受阻，货物的流动性和可渗透性同样降低。

边界管控的发展历程具有像素化、技术化、扩大化、弹性化等特征。对边界的认知从传统的线性化转向点状要素处的跨界行为。在像素化关口（诸如机场、海关等地）设置健康检查，防止病例传入成为疫情期间普遍的边界控制手段。这种检查也体现了边界控制技术化的特征：热扫描仪等海关检测基础设施空前发展，边界管理与机器、工具紧密联系在一起。边界管控还体现出扩大化和弹性化的特征：疫情下的检测和隔离使跨界需要更久的时间，跨界行为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增加，隔离时间和地点都被囊括在跨界行为之中，边界从线或者点的概念扩大为缓冲区域。

疫情期间，东南亚国家对人口流动实行了严格的边界控制，却对商品物资的流入提供了更多便利。对商品货物的跨界控制除了在关口进行检查，更多则通过政策鼓励或限制，完成对关键物资的跨界获取。随着疫情的缓和，边界的一些特征将逐渐消退，逐渐回归到多孔隙边界，但距离前疫情时代顺畅的跨界流通仍为之尚远。

快速演化的边界控制改变了人与物的流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家安全、经济等方面。疫情期间，边界控制的主要任务从传统的军事防御转向生物安全和生命安全等非传

统安全层面。随着官方通关渠道的收紧或关闭，通过非法途径跨越边界的行为增加，这些行为带来的安全问题较以往更为严重。偷渡和非法移民向来是中国与东南亚陆地邻国之间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重要问题之一，偷渡的现象更加泛滥，福建、广西等地防控任务严峻。

随着疫情在东南亚逐渐缓和，部分国家开始有条件地开放国家间边界。然而考虑到疫情暴发的不稳定性，边界的开放也将是慎重而缓慢的。短期来看，针对人员流动的边界开放将是协商、弹性的和动态的。首先，边界的开放将重新由双边或区域多边的谈判协商完成，在疫情防控表现较好、防控能力较强的地区首先开放。其次，边界将是动态的，可能随时根据双边疫情的发展情况进行重新调整。最后，边界将是弹性的，从完全封闭转变到多孔隙边界的过程中，边界的筛选功能将弹性缩放，以控制往来的人员数量。

长期来看，人员流动将随疫情消退逐渐恢复至疫情前的状态，但从产业链和贸易来看，有些行业可能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形成更稳固的边界。各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会将医疗物资等产业链迁回本国或能保障供应的地区，由于边界阻碍使一些产业链上的环节断裂，产业链将进行调整重组，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趋势将会加剧。中国与多数东南亚国家在疫情中恢复较快，本地生产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边界开放恢复较为缓慢，贸易的不通畅会冲击其产业链地位，加快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边界流动，加强区域内产业链的融合可能是应对冲击的重要方式。

泰国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博士生曾伟富指出，疫情期间，东盟各国分别选择了中国治理模式与西方治理模式，中国治理模式体现出了巨大优势，对东盟国家有借鉴意义。

曾伟富表示，选择中国治理模式的国家吸取了中国的抗疫经验，加强了新冠肺炎的知识宣传，要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对重点城市进行封城，收紧出入境限制，关闭了学校等公共设施，限制外出聚会，上述措施收到良好效果。以泰国为例，泰国在疫情暴发初期迫于西方国家的舆论压力，没有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疫情快速蔓延后，泰国政府迫于民众压力，效仿中国模式后才有效控制住了疫情。

中国治理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种具有优势的参考经验和治理选项。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大多数领导层有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能够结合基层实际情况做出决策；二是政策实施经过了全面的客观考量，领导层在制定政策时先以小规模试行，通过实践测试后再向全国推广；三是在治理过程中能够听取民众切实呼声，不断优化决策以符合民众的切身利益。

与中国治理模式相对的西方治理模式则强调民主、法治精神，在抗疫过程中私人部门各负其责，希望实现“群体免疫”的目标，而采用该种模式的国家却接二连三沦为疫情重灾区。此次抗疫过程显现了西方治理模式自身的一些缺陷：第一，西方式思维相对僵化，常常带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固思维特性；第二，西方中心思维模式常常打着“民主改造”的口号，对他国进行符合西方价值观的“社会文化改造”，

并冠以“普世价值”的面纱；第三，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缺乏足够的执政经验，不足以应对突发事件的考验。

采取中国治理模式的东盟国家多已进入抗疫尾声阶段，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减少疫情对国家的经济影响成为各国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东盟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在困境中依然保持较高水平，这与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重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加强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共情塑造有关。中国与东盟之间有着守望相助的历史传统，中国不仅在东盟抗疫的过程中提供物资与技术支持，同时致力于疫情后社会经济方面的合作。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东盟提供了一个中国治理模式的新选项。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国家模式发表论述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只适用于中国，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中国治理模式不具备模仿性。然而，在此次疫情期间，中国治理模式较于西方治理模式体现出了自身巨大的优势，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选项。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生张玉菊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缅甸疫情对中国的影响，讨论了中国对缅甸抗疫援助的重要意义。

缅甸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出现于钦邦，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缅甸政府的应变能力增强，但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仍需提高。出于历史上中缅两国的互助传统，以及人道主义、战略收益等因素的考量，中国对缅甸实施了援助。

中方根据缅方疫情发展态势制定了不同的援助措施。如果缅甸疫情完全失控，中方会加大边境管控力度，防止难民

大规模入境；派出医疗专家组入缅交流抗疫经验；在缅甸需要的情况下，中方会派相关人员入缅，协助缅政府维持国内秩序，提供物资支持。在缅甸疫情得到控制，但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方会在边界管控上限制人员的非正常流动；在必要时派出医疗专家组入缅，进行物资支援。在缅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方仍会对边境进行管控，防止人员的非正常流动；中方将帮助缅方加强对其医护人员的训练，提高他们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专业能力。

中方对缅抗疫援助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层面看，体现了中国携手缅方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考量。习近平主席在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时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但国际关系中仍然存在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中方愿同缅方一道，做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率，树立国家间交往的典范，推动国际社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方对缅方的援助有利于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中缅关系已进入新时代的发展阶段，双方需要携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夯实政治互信，扩大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疫情之下中国对缅甸的援助，深刻诠释了中缅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生动体现了两国人民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兄弟情谊。

从微观层面看，中国对缅援助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海外利益以及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中方在缅方需要时伸出援助之

手，体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以及中国人民的情怀担当，赢得了缅甸人民的尊重。中国协助缅方有效控制疫情，不仅可以促进缅甸民地武问题的解决，也有利于维护我国沿缅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目前看，缅甸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截至7月16日，缅甸确诊病例为339人，其中270人痊愈，6人死亡。疫情期间中国对缅方的援助在技术和物资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对缅方的援助也体现了在更大层面的战略考量，有利于促进民地武地区的社会发展，为缅甸国内民族和解进程创造契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系硕士生梁劲关注了新冠疫情下东南亚移民劳工的生存困境，探讨了东南亚劳工群体治理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移民劳工群体成为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一大薄弱环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第二版《国际移民工人全球报告》统计，2017年东南亚地区共有740万移民劳工，占普通移民的60.7%。移民劳工既能满足东道国的劳动力需求，也能为母国提供经济收益，推动母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

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劳工治理具有滞后性和不合理性，移民劳工面临合法权利被侵害的风险，威胁地区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不利隐患增加。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移民劳工的聚集性感染严重暴露了其生存困境。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移民劳工聚集性感染呈暴发式增长，远远超过了本地居民的感染人数，移民劳工成为新加坡防疫工作的一大漏洞。

移民劳工在此次疫情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生存环境恶劣。移民劳工群体大多居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廉价公寓和其他安置外来务工人员的简陋设施中。在狭小拥挤的环境中，他们无法保持合适的社交距离；多数无症状和轻微症状不易被察觉；病毒很容易在封闭空间内潜伏，并加速传染。其次，政府在防疫政策上对移民劳工和本地居民的待遇有所区别。移民劳工因难以获得公民身份而无法进入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享受到政策便利。第三，受疫情影响，各国的入境限制政策主要针对劳工在内的外国人群体，直接影响到移民劳工的生计，使他们丢失工作又无法归国。他们既无法享受本国的医疗待遇，又无法享受东道国针对新冠肺炎的医疗保障，移民劳工家庭也可能因收不到汇款而生活困难。最后，非法劳工问题也值得重视。移民劳工群体中存在大量非法劳工，他们大多以偷渡的方式进入东道国，缺乏合法证件，无法也不愿被东道国登记管理。非法劳工一旦感染病毒，他们一方面难以在东道国接受医疗救治；另一方面担心非法身份被东道国发现而选择逃避治疗。此次疫情期间，为了防止新冠肺炎在非法劳工群体中扩散，马来西亚警方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外劳，但是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会使劳工东躲西藏，切断了他们寻求治疗的途径，增加感染及传染病毒的风险。此外，执法人员也可能因搜捕而感染病毒，造成移民厅拘留所发生聚集性感染事件。

梁劲认为，各方应加强对移民劳工群体的重视，共同应对移民劳工的生存困境。首先，东盟需要加强对区域内移民劳工的保护。虽然东盟已经建立了针对移民劳工的保护机制，

但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东盟在跨国移民问题上的反应速度较慢。第二，东道国需要加强对移民劳工的管理和救助，包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对已经感染新冠肺炎的移民劳工进行及时救治。

疫情期间移民劳工的生存困境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东南亚各地区“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首先，“一带一路”项目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东南亚劳工聚集性感染的情况下，大批移民劳工短时间内无法继续工作。东南亚国家实行了大规模入境限制政策，大大减少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移民劳工流动。为“一带一路”海外项目提供服务的公司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风险。其次，移民劳工问题加剧了种族和移民冲突上升的风险。虽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府层面保持了抗疫合作的友好态势，然而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和社会中歧视华人劳工等排华现象依然存在。对移民劳工进行管理是疫情期间摆在各国面前的一道难题，考虑到疫情长期存在的现实性，移民劳工问题将不可避免地疫情长期共存，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需要加强对移民劳工的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张奕凡根据在缅甸皎漂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当地中资项目的发展现状。

与缅甸相邻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对油气的需求量不断激增，从中东海湾国家进口的原油须经过马六甲海峡才能运往中国。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在泰国克拉地峡、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缅甸实兑港等地开展关乎中国石油战略需求的工程项目相继出台。

中方起初希望与缅方合作，将若开邦的实兑港打造为一座深水港，作为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直至 2008年，缅甸军政府将实兑深水港的项目改造权交予印度，中方遂考虑建设皎漂港。缅甸军政府决定仿效深圳蛇口港的成功经验，将皎漂港建设为缅甸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1年，中缅双方达成了关于皎漂港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议；2013年，中缅油气管道的缅甸皎漂至云南安宁段竣工，通过该贯通中缅的油气管道，中国西部的云南、重庆、贵州等内陆地区得以使用来自缅甸皎漂的油气管道资源。

中资项目在缅甸皎漂建设时，面临着当地的民族问题。若开邦自缅甸独立以来便一直存在若开佛教徒与罗兴亚穆斯林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近年来，罗兴亚问题逐步上升到国际层面，罗兴亚人获得了西方的同情与支持。同时，作为冲突另一方的若开人却未受到相同的待遇，大量若开族民众对部分国外势力、国际非政府机构及西方媒体的好感度较低。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缅甸中央及大部分地区上台后，在若开邦执政的则是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若开民族党。若开民族党主张维护若开族的利益，并对罗兴亚人实行强硬的政策，这不同于国际上主张若开人与罗兴亚人和解的呼声。

位于缅甸北部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于2011年被叫停后，缅甸国内年轻一代对于中资项目的负面情绪增加。部分群体和个人认为，中资项目并未惠及当地老百姓且操作不透明，部分非政府组织、学生社团和农民团体甚至组织示威游行，反对相关中资项目继续开展，这种反面情绪同样也蔓延到皎漂。

自2010年改革以来，缅甸对外资的需求激增，除去军政府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中资，包括西方国家、日本、印度在内的资金也纷纷涌入缅甸，并在缅甸形成了与中资强烈竞争的态势。美国将缅甸视为重返亚太的重要一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总统任内两次访问缅甸。自2011年起，日本每年向缅甸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日本除向缅提供经济援助外，还特别注重软实力的植入，日资企业在进入缅甸后受到好评。缅甸国内的民调显示，以缅族为代表的缅甸民众认为，日本是缅甸最要好的伙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国内民族主义盛行；加之英印统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缅甸曾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印度国内甚至有民族主义者宣称，缅甸是印度失去的领土。印度媒体曾将中国在缅甸若开邦的港口建设视作“珍珠链”的一环，并在若开邦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最终取得实兑港的建设权，而中方只得退而求其次在皎漂港开展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使缅甸面临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缅甸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较低，据统计，因疫情关停的工厂、作坊约5600多个，超过25万名劳工失业。在此期间，缅甸外资吸引能力大幅下降，经济重回正轨并非易事。面对巨大经济压力的民盟政府同时也将迎来大选的挑战。当西方世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控制国内疫情时，将减少对缅甸的关注，民盟政府需重新权衡中资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目前是皎漂中资项目迎头赶上、重回正轨的良好时机。如何绝境重生，减少皎漂民众的顾虑，并做好与之商谈与周旋的准备，则是中资企业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以及相关中资机构仍应积极争取在皎漂港地区的项目建设，重启中缅皎漂-昆明铁路。中国在皎漂港口兴建项目对中缅两国具有重要意义，在缅甸的大选年应做好长期处理风险的准备，并在资金走出去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注重考量与工程项目相关的当地民生、文化、宗教因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马来西亚籍硕士生何宜贤围绕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口罩互动”对马来西亚国内政治进行了分析。

在中国武汉抗疫最严峻的阶段，马来西亚捐赠了1800万只医疗手套给中国，协助当地的医疗团队抗疫。而当马来西亚国内疫情恶化后，中国政府也对马来西亚进行物资捐助，帮助其抗疫。但同时，中国和马来西亚在一些领域也产生了摩擦，4月中旬，中国勘探船在马来西亚附近海域进行调查工作。中方声明，该勘探船是在中国管辖的南海海域正常工作，但美国却质疑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专注抗疫时，趁机扩大中国自己的主权申诉。马来西亚外交部则回应，勘探船进入马来西亚海域的事件可能带来误判，影响到该地区的和平局面，希望该事件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

何宜贤认为，疫情期间马来西亚在“口罩援助外交”、主权意义上的自主外交模式等方面，体现了东南亚地区中小国特有的外交对冲行为。“对冲”源于金融领域个人对风险认识采取的行为，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大国竞争形成了小国采取对冲行动的条件。小国进行对冲行为主要有三个特征：在大国竞争时不会明确站队；会间接违抗，但不会直接抵抗

来自他国的政治压力；在进行交涉的过程中多以低调的方式进行外交协商，而非采取直接对立的外交行为。

在大国政治冷战角力时，东南亚国家刚独立不久，基于特殊的国际政治背景，它们在外交方面采取了对冲行为。后疫情时期的马来西亚与中国进行外交互动时，体现出了其对冲行为主动与被动交织的特征。主动性体现在马来西亚自身对于主权的申诉，对地区事务治理希望占有领导权。被动性体现在马来西亚与各国的经济往来制约了其外交的自主程度。此外，马来西亚自身的国情特征也影响其外交的被动性。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包括伊斯兰社会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这些因素导致马来西亚在应对中国时，多会采取被动性的外交方式。考虑到自身的基础条件，马来西亚希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以协商的方式进行外交，而非选择直接冲突的方式。

马来西亚国内长期存在族群之间的对立问题，而在疫情期间，一些马来西亚政治人物又将该问题政治化。今年6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在接受香港《亚洲时报》专访时再一次提出了华裔富有论，强调在马来西亚城市的华裔非常富有，在马来西亚乡区马来裔的经济状况较差，二者间贫富差距较大。该问题对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乃至马来西亚的社会稳定有一定负面影响。

对于华人和马来人出现贫富差距的原因，何宜贤表示，英国在马来西亚进行殖民统治时，出于技术和资本的需要，建构了“马来人”的概念。而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也存在马来西亚各地王室与马来土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马来人”不仅是殖民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也带有马来西

亚王室的关系网络。马来西亚华人大部分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闽南、广东等地移民过来的华人群体，包含讲不同中国方言的华人、以英语作为媒介的华人、以马来语为媒介的华人。华人在马来西亚呈现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对马来政府的政策抱有防御心理，认为多数马来人具有政治强势性。

马来西亚在1963年独立后，华人与马来人面临不同的经济活动布局。华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城市，马来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乡村。1971年，马来西亚领导层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希望让马来人摆脱贫困，减小族群之间的贫富差距。然而，虽然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帮助部分马来西亚族群走出贫困，可是在该政策的长期施行过程中，更多的政策受惠者反而是少数马来西亚精英和少数富有的华人，马来族群分裂的概念也一直存在于马来西亚的政治认知里。

北京外国语大学宋清润副教授在点评时简要总结了东南亚研究的脉络，指出东南亚研究已进入更加深入细化的阶段，好的学术文章应做到将事实案例与理论结合，在案例分析之前应梳理相关理论的发展框架，长期细化地观察某个具体案例。在选题时应避免题目的涉及范围过大，有针对性地聚焦于新颖的题目。在论文写作时，应多强调中国与东盟双方的互动与合作，避免表达主观层面的中国优越性观点，造成迫使东盟国家接受中国文化输出的臆断。在具体写作时，应对一些概念进行区分和细化。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提出了4个维度的评价指标，希望该标准能够引导青年学者进步成长。首先，选题应具有时代性。青年学者应为知识界、社会、甚

至政策界提供一些变动中世界的新知识、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在分析新问题时可以对原有理论进行创新，用新理论去阐释问题；分析问题时可以采用大数据等新方法；新的知识可以学以致用，青年学者应锻炼提建议的能力。第二，选题应重视地方性知识的特殊呈现。第三，发言应有较高的学术完成度，应重视具体案例与理论体系的有机结合。最后，表达与互动的结合也非常重要。

新芽沙龙·第22期

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俄罗斯

2020年7月23日

今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国自新世纪以来面对的一场重大挑战，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巨大变化。为此，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主题为“疫情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系列新芽沙龙，邀请国内外青年学者就中国与周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发展进行研讨。本期沙龙聚焦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会议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庄仕琪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关贵海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担任评议人。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硕士研究生 Natalia Demina的发言主题是《疫情打击下的中俄经济联系》。

她表示，近年来中俄两国经贸往来日趋紧密，疫情暴发前，双方在石油天然气、电子产品和旅游三大领域经济联系特别突出。然而，疫情给两国经济合作带来严重影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疫情暴发后，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减少，每日消费量下降200万桶。与此同时，国际石油价格仅在二月初就下降了15%。天然气的情况大体相同，中国可能取消70%的天然气进口订单，国际天然气价格下降了约20%。疫情同样打击了中国对俄智能手机的出口，影响了俄罗斯消费者购买，造成中国制造商的损失。在旅游业方面，为了防范疫情，俄罗斯政府在二月下旬禁止中国游客进入俄罗斯。有估

计认为，由于中国游客急剧减少，俄罗斯经济损失将达到1亿美元。

如果疫情持续下去，中俄两国经济都会遭受更大损失，未来经济合作面临巨大挑战。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中俄两国都表示愿意加强相互间合作。不久前，中俄两国元首互通电话，展示了积极的姿态。特别是中国减少了从加拿大的石油进口份额，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这一决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总之，疫情虽然影响了中俄经济联系，但没有摧毁两国的政治合作基础，中俄经济联系的重要基础依然存在。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宋佳欣的发言聚焦中医药在俄罗斯。她首先介绍了中医药在俄罗斯的发展历史和现状。首先，中医药在俄罗斯没有合法身份，中医被视为是现代医学体系的替代疗法。其次，俄罗斯的中医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人打着中医的旗号诈骗，缺乏资质的中医馆被查封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俄罗斯对中药设置了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中药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前要经过繁琐的注册程序，加大了中医药企业的压力。最后，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西药类产品在数量上远高于中药类产品。

关于“如何更好地推动对俄中医外交”问题，宋佳欣从公共外交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为了提高本国的知名度和认同度，政府授权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外国行为体，通过媒体等传播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等手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受舆论三层理论启发，同时参考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调查报告，她根据向心力的大小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强弱，对政府、民间智库、媒体、企业和高校四个行为体进行了排序分层。她认为，智库和媒体是第一层级，企业和高校是第二层级，中俄两国政府推进中医外交的意愿至少要经过智库、媒体或企业、高校其中一个层级行为体的活动才能最终影响到俄罗斯民众。

基于以上分析，宋佳欣就推动对俄中医外交提出以下建议：在政府层面，中国政府应主导制定中医外交的宏观框架和行为规范，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为中医药在俄罗斯争取更多合法化机会。在智库和媒体层面，可以通过两国相关机构的交流增强俄罗斯智库和媒体对中医的关注，通过多种方式争取社会认可。在企业层面，中国政府应与俄罗斯政府交涉以适当降低中医药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适当放宽对中医药的审查，灵活调整中医药临床实验期；中方企业也应积极利用商业协会平台获取信息，与同类企业抱团发展，共享资源，协同开拓市场，将中医服务配合中草药产品一同走出去。与此同时，高校应培养面向国际的中医专业人才，使之在扎实掌握中医理论的基础上学习对象国语言和跨文化沟通技能。复合型中医人才培养离不开中俄两国共同努力，两国政府应加强医学高校间的学术交流，进行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协同攻关。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后庄仕琪的发言题目是《疫情之下的中国人赴俄罗斯留学》。他表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人口出生的低谷，这导致俄罗斯高校无

法招足学生，也无法获得足够的学费收入。尽管政府增加了对高校的资金投入，但被物价、费率等因素抵消，俄罗斯高校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扩招外国留学生的愿望。与此同时，中国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和求职压力，而留学归国人员在求职和就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此外，中俄两国将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作为中俄友好的三大支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人赴俄罗斯留学热情高涨。

庄仕琪指出，中国学生起到了重要的信息传播功能，他们带回来的信息有助于打破中国公众在上个世纪形成的对俄罗斯的刻板印象。在俄罗斯，中国学生的大批涌入也为俄罗斯公众了解中国打开了窗口，但也因数量庞大令一些俄罗斯人产生了威胁感。疫情暴发后，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人一度被污名化。由于疫情暴发之初的管理不善，俄罗斯出现了抢购热潮，留在俄罗斯的中国学生生活陷入困境，而回国不仅机票价格昂贵，还将面临巨大的被感染的风险。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俄罗斯高校招收中国学生的热情不减。据统计，拥有中文网站的俄罗斯高校已经达到98个，甚至有一些俄罗斯高校已经希望中国的高中生在毕业后直接向他们递交申请材料。整体上看，申请俄罗斯高校的中国学生数量有所增多，原因在于俄罗斯高校招收中国学生的两大支柱（即俄罗斯的经济困境和中俄两国对留学生事业赋予重大政治意义）并未被削弱。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邹文卉的发言题目是《从新冠疫情应对看俄罗斯强国家、强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基层社区运作》。

邹文卉首先分析了俄罗斯疫情形势，指出俄罗斯的防疫形势虽然整体稳定，但已明显陷入瓶颈。尽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风险管控策略，但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仍居高不下，疫情消退动力不足。她指出，对俄罗斯疫情防控效果不佳问题的解释主要有四个路径：第一，试剂准确度和防护物资供应的不足导致无法有效判断、筛选和确定感染者，使得不同地区的小规模传染持续发生。第二，宗教保守主义阻碍疫情控制。第三，绝大多数人的经济条件不允许长时间自我隔离，导致针对封锁措施的集会抗议，进而造成集体感染。第四，民众防范意识薄弱，对防疫措施遵守程度较低。在上述四个解释路径中，除了第一个路径与技术设备条件有关，其余三个路径的核心都在于民众对防疫措施的遵守程度不高。换言之，政府出台的抗疫措施不能很好地在基层落实。与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在各方面推行强国家-强社会的治理理念，既强调俄罗斯治理秩序中社会参与的部分，也坚持国家在治理与法治建设中的主导性地位。但是，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中，强国家与强社会结构在基层的落实显现出了无力和混乱，这是导致俄罗斯防疫陷入瓶颈的重要原因。

邹文卉认为，为了维护苏联解体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俄罗斯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法律体系和架构设计上都比较完善。在法律体系方面，普京执政后签署的《紧急状态法》和《战时状态法》标志着俄罗斯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法律体系基本确立。在架构特点上，俄罗斯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以总统为核心，以联邦安全会议为决策中枢，形成“大总统、

大安全”的中枢指挥系统。此外，公共危机管理支援保障系统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指挥系统的决策，包括国家安全、警察、消防、医疗、卫生等部门，其目标是保障快速有效地调动所有社会资源应对危机。俄罗斯在疫情初期迅速颁布的断航、封城、限制出行等一系列政令，证明权力高度集中的确保证了指挥中枢的快速反应和有利决策。然而随着时间推进，本该强有力贯彻决策的公共危机管理支援保障系统却“深陷基层社会”，难以有效运行，其原因在于新冠疫情相较于政治权力危机、金融危机和内战危机有着延续性长、传染性强、极具个体性的特点，需要细致和深入的基层统筹管理。总体而言，俄罗斯政府对基层社区的监管以事件为导向，较为集中和松散。支援系统中的医院、警察、卫生等机构没有在疫情期间建立完善的沟通和统筹平台，基层治理的实施体系杂乱不畅。

从政治结构看，当代俄罗斯的基层治理主要通过地方自治实现。俄罗斯的地方自治以居民居住的一定行政区域单位为基础，通过地方自治机关自主解决地方事务。地方自治机构的权限范围广阔。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保障联邦法律和上级国家机关文件在本地区内的贯彻执行，在紧急状态下负责维持地方安全和民众秩序等。现有研究普遍指出，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很难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一方面，国家规定对自治地方领导人的约束力不足，区域权力体系中非正式机制的普遍存在也为地方威权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往往难以提供真正的保障，其职权虽然被下放到地方，但缺乏物质保证。

从个体层次看，地方自治空间被错综复杂的社区群体填满，在公共危机中吸收、分散、消解了中枢指挥系统的控制力量。这些社会团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公民个人和代表居民利益的主动性团体；第二类包括非营利组织、地方居民自治机构、住房私有者协会、住房管理公司、街道委员会等。这些自治团体既存在功能交错或缝隙，又往往与市政当局有着复杂的关系，成为市政府基层治理的“腿”，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为内部勾连相互掣肘。

针对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抗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邹文卉认为，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在此次疫情中的确在物资援助、心理和基础设施支持、法律服务、信息收集、政策反馈等方面为民间治理做出了贡献，但其实际行动力需要结合更多信息才能准确认识。由于大量非政府组织主要依靠社会和企业捐赠，因此在公共危机期间很容易陷入失能状态。

最后，邹文卉将俄罗斯“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设计和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她指出，两国虽然在不同时期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动过程，但中俄经验存在根本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单位功能集中下沉到社区，此前的治理模式和人员结构不能应对快速流动的治理主体和飞速扩大的治理人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重新实现基层控制和行政化的努力。但中国始终明确不能让社区脱离国家，必须填补社会变动中的管控孔洞和缝隙，缩小治理半径和网格，把行政管理落实到基层，这也是所有成功或失败的尝试所指向的根本目标。而俄罗斯在各方面对苏联“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的摧毁过于激进，使得在乱局后重建国家

能力体系的道路格外艰难。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全盘西化”的变革战略明显暴露出了法治的缺失，国家开始失去对基层社区的掌控。此后无论是通过重建垂直权力体系，还是强调社会力量参与民间治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的毛细血管已难以修复，在危机事件中也不免力有不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谭学超**的发言主题是《疫情下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历史纪念与中国的鼎力支持》。

谭学超认为，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国际政治方面，俄罗斯与中国遭到了西方国家集团的围堵和攻击。在这种大环境下，政治上的道义支持非常重要。以俄罗斯高规格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为例，在纪念活动期间，中国始终给予全力支持，甚至派出了三军仪仗队参与6月24日的阅兵。在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方面，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西方和东方的主战场上分别与德国和日本两股法西斯势力顽强斗争，而且在宏观战略上给予了对方支持和帮助。由此看来，俄罗斯与中国的有关纪念活动可以说是对各种试图歪曲历史、抹杀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行径的有力回击。

结合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中苏两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评价，谭学超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道义互助并非只出于现实考虑，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和国情因素，双方的核心原则和立场基本一致。尽管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俄罗斯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这些挑战和历史因素以及现实环境的有机结合为中俄两国的外交与合作创造了特殊契机，并且赋予了其更大的现实意义。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生张君义的发言聚焦新冠疫情背景下中俄科技合作中的重点领域。他认为，当前中俄科技合作的开展有着广泛而复杂的背景。首先，中美间结构性矛盾在过去五年中进一步激化。第二，《瓦瑟纳尔协定》与其他出口管制机制的强化。第三，中俄关系明显转好。第四，俄罗斯国防工业恢复进程加快。第五，中国面临产业升级、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可靠动员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三重任务。第六，2020年至2021年是中俄科技创新年。第七，新冠疫情对中俄科技合作具有推动作用。

张君义认为，中俄科技合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合作以国有部门为主，两国国有企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是承担合作的主体单位。第二，合作主要集中在军事、能源、装备制造、冶金和交通领域。第三，教育与科研并重，两国高校间设立有合作机制。第四，双方合作周期长，相关合作体量大。

关于未来中俄科技合作的趋势，张君义认为，首先，中俄间科技合作将由过去的单向输出转向双向互补型输出。其次，中俄对具有防御性特征的先进敏感技术合作持开放态度。最后，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先后更新核武器库，任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威胁恢复核武器的生产与核试验，放松了对核试验实战应用的军事条例限制。由此，中俄未来可能在核工业、航空和航天工业、大型地下工程以及和平利用核爆炸方面进行合作，且合作领域会长期集中在中国较为弱势的重工业与国防工业领域。中国在冷战条件下维持和建设国家能力的领域存在诸多不足，而俄罗斯在充分组织和利用国内资源维持

和建设国家能力（即动员型发展模式）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因此从长期角度审视，中俄的科技合作不仅潜力巨大，而且必然从单纯的“技术合作”转变为“体系合作”，充分发挥两国在不同领域的专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关贵海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施越针对上述发言分别进行了点评，分析了相关研究内容的优点和缺点，并指出，对于各位同学而言，第一，尽管目前条件不允许，做研究很难，但由于是学术论坛，因此每个人都要立足学术，研究内容要有依据、有论据，所有事实、数据都要注明出处，而且出处得要可信。第二，不是所有俄文资料对于俄罗斯研究都一定可靠。第三，要注意学术措辞表达。第四，一切真理都来自于实践，没有调研、实践和体验观察支撑的研究都是有风险的，是经不起他人挑战的。最后，研究选题不要赶时髦，不能通过“标题党”吸引观众，要通过抽丝剥茧的工作去挖掘和推导，进而展示大家的知识和学理程度。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总结时表示，新芽沙龙是研究院为年轻学者针对学术和现实问题发表意见、锻炼能力提供的平台。今天围绕“疫情后中俄关系”这一主题，各位青年研究者提出了诸如中医在俄罗斯、中俄科技合作、俄罗斯强社会-强国家体制等有意思的话题。整体上看，各位发言达到了一定水准，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针对问题就事论事多一些，但对其背后的原因分析不够。

今天的主题表面上看是国际关系问题，但如果仅就关系谈关系，是没办法说清楚的。两国之间的关系背后有很多影

响因素，包括思想因素、理念因素，以及各自国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涉及层面和领域非常广。只有对各方面的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国家间的关系，而这又需要各位加强个人的研究能力和思维能力，以及身后的知识储备。因此，建议各位青年研究者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时，要加强对国际关系以外各种各样知识的认识和理解，要避免单纯地就事论事。